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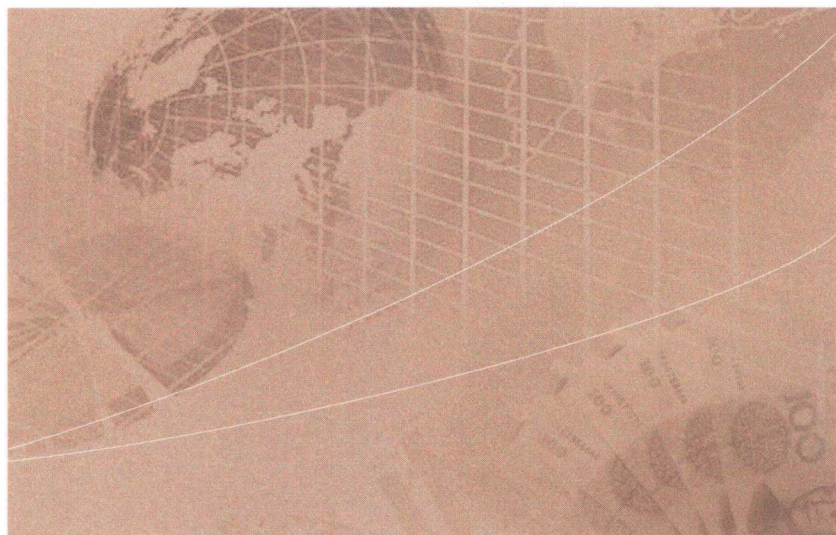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纪念国家开发银行成立20周年

金融、发展和改革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沈联涛◎主编

Edited by Andrew Sheng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014033896

F832.3
26

谨以此书纪念国家开发银行成立20周年

金融、发展和改革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沈联涛◎主编

Edited by Andrew Sheng



北航

C1721633

F832.3
26

08888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发展和改革: 汉、英/沈联涛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086-4415-8

I. ①金… II. ①沈… III. ①开发银行—中国—文集—汉、英 IV. ①F83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0403 号

金融、发展和改革

主 编: 沈联涛

译 者: 徐冰 等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比较》编辑室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4415-8/F · 3123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序

在国家开发银行成立 20 周年之际，由沈联涛先生主编、汇集开行国际顾问智慧和心血的《金融、发展和改革》一书即将付梓出版。阅读各位老朋友的一篇篇文章，回首开行 20 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特别是与各位国际顾问的每一次深入交流探讨，我感慨万千，心绪难以平静。

1998 年 4 月，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我从央行调任开行行长。当时的开行可谓内外交困，一方面自身不良资产高达 40%，一方面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遭遇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开行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作为政策性银行，开行应该怎么办，如何发挥自身作用，处理好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成为摆在我面前的重大抉择。经过慎重考虑并请示朱镕基总理同意，开行决定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并十分荣幸地邀请到国际政界、学界和业界翘楚，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担任开行国际顾问，为开行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

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 1999 年成立以来，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顾问会议议题广泛、内容充实、探讨深入，通过思想交流、观点碰撞、经验分享，顾问们的真知灼见丰富了开行人的知识储备，拓展了开行人的国际视野，为开行改革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顾问们的穿针引线，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开行乃至对中国的了解，为开行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今，国际顾问委员会已伴随开行走过了 15 年，开行也将迎来成立 20 周年。在包括国际顾问等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在开行人的努力下，开行已经发展成为中国中长期投融资的主力银行和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基础设施、城镇化建设、社会民生和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

优良的经营业绩，资产规模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资产质量保持国际一流，不良贷款率连续近9年低于1%。开行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各位国际顾问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对此，我和所有开行人永远铭记在心！

特别感谢沈联涛先生和各位国际顾问，他们为编写这本书付出了大量心血。这本书的各篇文章分别由各位国际顾问和开行现任领导撰写，内容涵盖地缘政治、国际治理、金融改革和开行发展，既有对理论的探讨和思考，也有对实践的分析和总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

虽然我已不在开行工作，但我会永远关心、支持开行的改革发展，希望开行的明天会更好，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相信各位国际顾问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开行，关心中国的发展进步，我想这也正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陈元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于北京

引言

沈联涛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三大政策性银行之一，主要负责为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建设项目提供中长期融资。开行不辱使命，特别在过去10年间，助力中国经济蓬勃迅猛发展。开行融资支持了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其中包括三峡水利枢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北京奥运会场馆设施和上海世博会等工程。开行投资的项目遍布全国，涉及基础设施、基础产业、能源和交通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助推老工业基地振兴。

1998年，陈元先生开始执掌国家开发银行。在其后的15年间，陈元先生全力推动开行向世界级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变。开行以市场为导向，引导资源投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开行锐意进取，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向国际标准靠拢，尤其在资产质量管理方面。开行的风险管理取得长足进步，不良贷款率从1997年的40%降至2003年的不足1%。尽管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开行始终将其不良贷款率维持在这一水平。

2008年12月，国家开发银行正式开始商业化改制，陈元出任董事长。改制后的开行通过中长期投融资支持国家“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政策的实施，同时推进自身商业化改革，业务集中于六个方面，通过商业化运营为结构调整、普惠民生、现代化和全球化等国家重点领域提供支持：

1. 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确保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以下四大类贷款：
 -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下中央政府批准的投资项目。
 - 扩大内需，如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生态环境等。
 -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南水北调、高铁、公路、核电站和上海世博

会等)；重点行业和融资瓶颈领域(如煤、电、油、运、农业、电信业和公共基础设施)。

- 环保节能项目以及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发展项目。

2. 促民生的基层金融贷款，包括支持“三农”、城乡规划、中小企业、低收入住房和助学贷款等。

3. 融资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包括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拉美和非洲提供贷款。

4. 把开行建设成一流的债券银行。

5. 推动经营业务的商业化运作和调整，以持续得到改善。

6. 强化企业内部风险管理架构和全面风险管理实践。

截至改制后的第一年即 2009 年末，开行累计发行(本外币)债券超过 5 万亿元；其中人民币债券 3.3 万亿元，占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总发行量的 25%。2009 年，开行在香港成功发行 30 亿元人民币债券，成为中国境内首家推出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基准的人民币浮息债券的银行。截至 2009 年末，开行总资产达 4.5 万亿元，净利润总额 319 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 0.94%。

本着“控总量、保重点、调结构、防风险、促协同”的核心原则，开行在上述业务领域保持强劲增长，经营业绩连年攀升。据 2012 年财报显示，总资产越 7 万亿元大关，达 7.52 万亿元(1.21 万亿美元)；不良贷款率连续 8 年低于 1%；资本充足率接近 11%；净利润增至 630 亿元。

过去 10 年(2003~2012 年)，开行累计向 4000 多个项目发放贷款 16000 多亿元。2012 年，在银行业对能源、农业、水资源、电信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国家重大领域的投资中，开行占 39.3%。在民生领域，2012 年开行保障性住房贷款占全国银行贷款的 60%；创新的贷款模式惠及中小企业；累计有 770 万名学生获得开行的助学贷款。在环保领域，2012 年开行绿色信贷和低碳融资达 2490 亿元，支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项目。

在大力拓展国际业务的过程中，开行继续加强与外国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投资大型国际项目，支持基础设施、农业、能源和社会领域发展，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截至 2012 年末，开行外汇贷款余额 2245 亿美元，离岸人民币贷款余额 726 亿元。开行与全球 101 个国家和地区的 638 家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推动国际业务的发展。

开行的成绩应编为案例加以研究：在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的基础上，转向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模式，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开行今天的成就归功于卓越的领导，尤其是陈元先生的远见卓识和身体力行。掌舵开行 15 年后，2013 年 3 月 11 日，陈元先生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4 月 15 日卸任开行董事长一职。在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陈元先生获得国际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称号。

谨以本书献给陈元先生。本书记录了有幸与陈元先生共事的人们的所言所想，时间跨度从 1988 ~ 1989 年中国金融改革伊始、陈元先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时到其后执掌开行期间。我和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先生非常荣幸也十分感谢开行国际顾问会的委员们慷慨撰文，讲述陈元先生在中国金融转型中的作用。本书汇聚了 17 位世界级政治家、外交家和金融界思想领袖的真知灼见，既有他们对于中国最初的印象，也有对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见证。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的开放。第二部分描述中国金融体制和机制的建设。第三部分强调全球增长伙伴的重要性。第四部分畅想打造国家开发银行的未来。

第一部分 中国的开放

这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由亨利·基辛格博士、保罗·基廷阁下、保罗·沃尔克先生和弗雷德·伯格斯坦博士撰写。他们都是国家安全、领导力和金融领域的权威。

亨利·基辛格博士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 1973 年至 1977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他所促成的 1972 年中美元首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也为邓小平开放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历史性决定做了铺垫。

2013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他就“中美关系”进行了特别发言。基辛格博士从一个恢宏的历史角度出发进行阐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80次访华让他亲历中国历史，中国也给他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中国具备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取精神和所有条件。他一贯坚信，维护世界秩序的关键是中美两国的合作。现实验证了他这一坚定信念。

基辛格博士希望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一共识能转化为具体政策，以实现共同目标，解决全球在能源、环境、核不扩散、网络和空间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由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理念不同，这一过程存在很多挑战。美国认为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而中国则认为所有解决方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但是，看到了中国的现状并结识了有如陈元这样的杰出领导人后，他对中国目前的政策措施非常乐观，认为这为中美两国时隔多年后重启真诚对话奠定了基础。届时，世界将会看到两个大国如何合作搭建新型国际秩序。

保罗·基廷阁下是澳大利亚的第24任总理（1991~1996年），是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在其“亚洲新秩序”一文中，基廷先生从政治和历史的视角，对目前新型全球经济秩序进行了全面讨论。他哀叹于1991年冷战结束后全球领导力的缺失，世界经济因而没有进入良性运转轨道。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和发达国家的危机使发达经济体的地位大大降低，美国的领导力更是严重受挫，而欧洲又被自己的货币联盟危机所绑架，因为这一联盟中的经济体千差万别。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增长中贡献率约占四分之三，发达国家已然成为全球转型过程的推动力量。但是，基廷先生认为，依靠高投资和高出口的增长模式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加紧建立一个解决国内问题的增长模式，包括增加国内消费和服务、提高收入并满足人口城镇化的需求。他认为中国和亚洲在改变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从传统的财政货币杠杆向更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系统的转变。

保罗·沃尔克博士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是最德高望重的中央银行家和金融事务评论员之一，他撰写了“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金

融的发展”一文。

这是篇回忆录，回顾了多年来他与中国的关系及与陈元先生的交情。20世纪80年代，他见证了中国摆脱高度集中、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过程，从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低下到经历了史上最辉煌的持续增长期，到如今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1988年至1998年期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成为开发性金融的掌舵人，陈元先生是这个奇迹故事不可或缺的人物。沃尔克先生追溯了政策思考、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改革、中国金融市场转型，尤其是这些年来建立正确的机构以及机构改革的重要性。陈元还具备解决通常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的勇气，例如腐败和人才机构建设的重要性等。

弗雷德·伯格斯坦博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名誉所长，从2002年起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撰写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领袖**”，为中国成功融入全球领导体系所必需的步骤提出建议。历史证明，新兴经济大国融入全球领导体系极具挑战性，但对于维护全球稳定乃至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必要的系统调整可能会成功，但如果失败将会带来严重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融入全球领导体系的任务给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带来了艰巨的责任。要实现顺利的过渡，大国必须愿意与后来者分享领导权。后来者也必须愿意接受国际赋予的领导职责，认识到其行动的外部影响会反作用于国内经济，也要认识到跻身国际、世界一流的实力同时意味着责任。

2013年的世界经济秩序呈现多极化格局，至少有十多个经济体对全球经济表现举足轻重。这一多极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而多极化不断加深的趋势已经在世界经济秩序的体制中得到了体现，即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领导的主体。然而二十国集团过于庞大，难以有效运转，因此需要一个小型的“协调员的协调组织”来充当世界经济的非正式指导委员会。这个组织的理想构成是三大超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

由于欧盟目前疲于应对金融危机，不适合担当重大国际角色，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事务的主要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中美两国肩上，无论这两国是否要给这一安排贴上“两国集团”的标签。一方面，在近年来，尤其是应对2007年至2009年的危机期间，中美两国在履行这类责任方面毁誉参半。另一方面，

两国均未采取一些确保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必要措施。此外，在若干问题上，中国与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盟成员）的合作似乎有所倒退甚至出现逆转。

有效建立和维护一个成功的世界经济秩序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创造和领导。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从国家利益的界定出发，明确中国自身的体系目标和政策。第二步是就中国的想法认真开展国际大讨论，与其他主要国家集思广益，就新的安排和修订现有机制达成一致。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又充满争议的，但其回报也是不可估量的，有助于定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世界经济在中国国内政策中的地位。

第二部分 中国金融体制和机制的建设

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由伊瑟尔·森卓维克先生、沈联涛先生、黄记祖先生和翟健先生撰写。

伊瑟尔·森卓维克先生曾任纽约联储银行执行副总裁，他的文章讲述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的建设”的个人参与经历。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银行资助了中国的支付系统开发建设项目。森卓维克先生是国际顾问专家组的成员，为项目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见。在此期间，他与陈元先生结下了长久的友谊。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个人角度回忆了推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后的变化。作为当时负责该项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先生对中国支付系统（全名为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设计和建设工作功不可没。项目有两个指导团队，国内顾问专家组和国际顾问专家组。森卓维克先生讲述了面对如此复杂的项目，陈元先生如何在双方之间有效突破语言障碍，并克服东西方的工作文化和思维差异；为了执行如此重要和大规模的项目，他又是如何确保支付系统的各个方面均得到了认真的研究，并确保重要的技术标准、会计结构、法律框架、处理程序和组织架构得到了恰当的协调。

沈联涛先生是前央行和金融市场监管官员，目前担任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他撰写的“陈元在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发展中的作用”是对森卓

维克先生一文的内容补充。他通过详细介绍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发展过程向陈元先生致敬。该系统确实是中国金融系统最重要、最复杂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内和国际顾问专家的帮助下（其中森卓维克先生发挥了主导作用），陈元先生带领团队，制定了现代化、高价值支付系统的概念和蓝图，这一系统是对中国银行和会计程序以及金融监管和法律框架的彻底改造。项目在1994年进入国际招标阶段，从1996年开始建设，并在此后的10年内在全国推出。CNAPS的核心部分，即人行账目的大额支付系统（HVPS）于2005年上线。在2006年至2011年期间，HVPS的年度交易量增长了5倍，达到1355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没有CNAPS，中国的金融发展，包括银行体系的商业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不会如此顺利。

黄记祖先生曾任星展银行的副首席执行官，目前是新加坡凯德置地集团的董事长。他在“开发性金融机构相对于商业银行的功能及定位”一文中分享了他的观点。黄先生基于其在星展银行33年的工作经验，介绍了开发性金融机构（DFI）在快速变化的中国经济与金融环境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在金融行业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商业银行将逐步退出传统的政策性贷款领域，从而将这一职责留给DFI，尤其是支持国家主导的各类开发项目及省市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在他看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DFI，国家开发银行应该利用自身的竞争力，提供长期融资、项目融资、投资银行和顾问服务，履行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性贷款职能。国开行已经在运用国际先进经营理念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相信这对开行向国际一流银行转型至关重要。

翟健先生曾任荷兰国际集团（ING）亚太区首席执行官。他在“在华经营的外资保险企业：迎接挑战、促成变革”一文中分享了他的观点，对中国保险业的增长、发展路径以及外资保险公司在推动行业持续演化的过程中可发挥的作用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在2001年至2010年的10年间，中国的保险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形成了国内保险公司为主、外资保险公司为辅的格局。保险业的发展将继续受到财富增长的推动，未来对消费耐用品和住房保险的需求将继续上升，而人口老龄化将增加对医疗保险和储蓄计划的需求。因此，进一步开放市场，让外资险企帮助新兴的保险市场改善服务和提高效率，并将巨

大的国民储蓄用于支持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

第三部分 全球增长的合作伙伴

第三部分的五篇文章分别由雅各布·弗兰克尔博士、乌里·希克博士、浦伟士爵士、韦德颖爵士和行天丰雄博士撰写。五篇文章都显示了全球视角对开发性金融的重要性，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和其他国家的经验。

雅各布·弗兰克尔博士是以色列央行前行长，现任摩根大通国际主席。他对本书做出了宝贵贡献，所撰写的“国际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文，对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宏观经济形势、贸易和外部失衡的趋势、欧元区的困境以及深层次的失业和让就业雪上加霜的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进行了连贯缜密的分析。他传递的信息是，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用短视的政策来解决。我们需要着眼于长期的方式来处理政府与公民之间契约性质的变化。在探讨城镇化对发展的影响时，两个主要政策支柱分别是：（1）为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创造就业；（2）为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活动提供融资，无论是中小企业还是大型基础设施。正是在长期投融资领域，也就是支持高效、节能环保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上，需要国开行发挥重要作用。

乌里·希克博士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担任瑞士驻华大使，目前是多个跨国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他在“公私合作和机构投资者之发展”一文中对二者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见解，并分享了他与陈元先生合作成立私募基金的经历。1997年，瑞士政府和中国政府成立了第一个合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私募可以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来支持在华的瑞士和中国中小企业发展。这一中外联盟的成功依赖于三个重要因素：（1）了解宏观经济周期和投资时机；（2）选择正确的行业；（3）在投资组合公司的管理中灌输专业、忠诚和正直的原则。为了确保长期可持续性，该基金只投资对具体行业和社会具有持久积极影响的项目，对娱乐或奢侈品等行业则敬而远之。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基金为中国内陆中西部和西南地区的中小企业提供资源。

浦伟士爵士是汇丰银行控股集团的首任董事长，在汇丰工作了44年后于1998年荣退。他在“银行业的开放”一文中分享了他对中国开放银行业的回忆。听说陈元先生将从开行退休，浦伟士爵士特地致函陈元先生，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分行的困难。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给汇丰颁发了几个分行牌照。如今，汇丰在中国已有100多家分行。在人行以及开行担任领导期间，陈元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开放思维在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的逐步开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韦德颖爵士是巴克莱资本的副董事长。他在关于“中英关系及国际化改革”的文章中分享了他的经验。他认为中国向国内消费驱动的经济转型必须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实现收入从国企向民营部门和家庭的转移，并填补国家养老金系统的资金缺口。因此，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香港人民币债券离岸市场，是支持中国经济扩张的长久之计，同时也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除了依赖政府发行大规模全球基准利率债券外，开行也应当利用其主力政策性银行的地位，为期限较长的债券设定基准利率。与此同时，开行还必须履行社会职责。开行的众多成就还包括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战略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助力企业并购、支持战略新兴产业、文化产业和中小企业，并提供学生和住房贷款。由于意识到有效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是稳健经营的关键，开行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金融机构典范，能为客户、员工和业务所在的社区创造明确的价值。

行天丰雄博士是日本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的高级顾问和日本前大藏省次官（副财长）。他的文章“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日本经济”对金融危机进行了综合分析，其中包含四个要点：（1）从泡沫产生到破灭的过程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信贷紧缩和需求骤减；（2）一场普通的金融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危机，原因是当今世界金融交易的全球一体化程度已非常之高；（3）危机给不同市场带来的影响不同，取决于各个市场的具体结构和条件；（4）国际金融危机触发世界经济格局开始改变，全球权力也相应出现了转移。

亚洲，尤其是中国，将受到欧元危机的影响。虽然实体经济重心正在向亚

洲转移，但亚洲依然极度依赖欧美金融市场媒介。因此，亚洲应当加强区域合作，强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日本目前正在实行“消除通缩”的经济政策。但是，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鼓励私营部门投资的增长战略可能还不够。如果日本经济想在 2020 年前实现基本财政收支平衡，企业和家庭必须消费，财政整顿必须继续，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缩减，税收必须增加。

第四部分 打造国家开发银行的未来

最后，第四部分的四篇文章分别由胡怀邦博士、刘遵义教授、汉斯·瑞奇先生和已故的安浩德爵士撰写。这四篇文章为开行在充满未知数的未来如何定位的问题上提出了建议。

胡怀邦博士是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基于在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工作的丰富经验撰写了“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一文。文章回顾了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推进国际化发展所作出的努力。自 1917 年中国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起，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化经营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 2012 年，中国银行业的境外资产已达到 1 万亿美元，形成覆盖全球的网络布局，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随着人民币在跨境投资和贸易中的使用不断扩大，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的稳步实施，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复苏充满不确定性，同时全球金融监管趋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稳妥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强创新，提高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对中国银行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胡董事长做出了客观准确和严谨务实的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

刘遵义教授是中投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和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撰文题为“‘十二五’规划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为“十二五”规划（2011 年至 2015 年）和人民币国际化如何为开行带来巨大机遇提供了分析和

实用的讨论。“十二五”规划承诺将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将战略从生产资料驱动型转变为技术和创新驱动型。这就需要对基础设施项目和保障房提供长期融资，而这正是国家开发银行的强项。

例如，为了推动技术和创新，开行可以为中国国家光纤网络和新技术商业化试点工厂的建设提供融资。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开行可以利用境外人民币日益增加的供应和用途，进一步推进业务的国际化，例如为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提供长期人民币贷款。刘先生呼吁开行保持其国有全资政策性银行的地位，利用比商业银行成本更低的长期固定利率资金，为社会经济发展项目提供长期融资。

汉斯·瑞奇先生是花旗集团全球市场公共部门主席，在他题为“**国家开发银行与未来的金融格局**”的文章中，瑞奇先生回顾了1994年3月开行成立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状况。在陈元先生的领导下，开行的业绩超越了一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范畴。除了让这家背着不良贷款负担的银行扭亏为盈外，陈元先生对开行进行了组织机构和战略调整，包括建立卓越的风险管理体系、重新制定业务战略重点、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银行业务的国际化，以及加强全球沟通，以吸收其他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最佳实践。这一战略的成功使开行的资产增长了10倍，截至2010年已达到8000亿美元，盈利能力与增长并进，而不良贷款率则下跌至0.7%。开行成为了资本市场的创新者，例如首次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对于开行未来的业务模式，瑞奇先生提供了三大选择：（1）将政策性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合并；（2）把国家开发银行打造为一家全能银行；（3）开行保持其公共部门融资机构的定位不变。无论其未来的最终决定是什么，开行都是一家财务稳健的银行，也是中国金融业的标杆，其优势和成就要归功于陈元。

安浩德爵士（已故）是知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在1994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国际清算银行行长，还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2005年至2010年期间担任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2012年9月安浩德爵士突然辞世，而此前他一直日程繁忙，无暇专门撰写一篇献给陈元先生的文章。作为次优方案，他曾提议将他在2009年10月关于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会议上的午宴演讲

收录进这本纪念文集。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全球金融架构”，会议由位于圣芭芭拉的旧金山联储主办。

其实，用这篇文章作为本书的结尾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全球金融架构”包括三个支柱：（1）支撑国际金融关系的基本经济模式；（2）用于管理这些关系的体制安排；（3）体系中的决策权如何在各个国家之间分配。这三个方面都在发生变化：（1）“二战”后由政府主导的国际金融关系的基本模式现在已转化为市场驱动的模式；（2）世界经济中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上升。这就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关系中决策权的分配问题上获得更多话语权。虽然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对亚洲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什么样的国际金融体系能够最好地满足它们中长期未来的需求。借用安浩德爵士 2011 年在题为“面向 21 世纪的金融体系”的佩尔·雅各布森讲座结束语，“……为设计一个全新、更稳固的金融体系……它应该是全球的、稳健的，为实体市场经济有效服务的。”